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的范式与反思

胡友峰

摘 要: 20 世纪中国美学已经在多向度、多层次上得到学界的充分探究,但关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有所欠缺。审视 20 世纪中国美学复杂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生态,研究者主要运用了知识型与思想型两种书写范式,从而使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呈现丰富的样态。知识型书写范式专注于美学知识的内在发展和美学体系内部逻辑化建构的书写方式,强调美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性、整体性与谱系性,并可以划分为“具体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美学学术论争”“古今美学关系”等三种类型。思想型书写范式将美学视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美学“症候式”研究方法与意识形态效应,将美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进行有效整合,包括“现代性角度”“主题史方式”“审美理想史范式”“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跨文化视野”等若干类型。但是,在美学史研究和书写上依然存在一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涉及 20 世纪中国美学原始文献处理问题、中国美学史书写的逻辑思路问题、中国美学精神提炼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能够为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推动当代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的交流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范式;美学精神;审美救赎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3) 06-0099-12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生成、发展与流变构成宏大的美学百年发展史,形成了包含理论知识与学科话语等多层次的整体系统,推动中国美学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在此过程中,美学史书写的知识谱系与理论本体研究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话语体系。^①然而,美学史书写研究不仅仅包括理论本体研究,也需要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整体架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深入阐发美学史书写的不同范式,凸显“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质。一方面,美学史研究包含了多元维度的具体研究,比如美学家的理论、美学核心概念范畴的历史、美学问题的历史等,这些共同构建、

作者简介: 胡友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18ZDA024)

①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进行理论本体研究的成果包括一些论文,例如王德胜:《20 世纪中国美学与学术史写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王元骧:《我看 20 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发展趋势》,《厦门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戴阿宝:《20 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7 期;王建疆、杨宁:《中国美学的学科发生与学科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4 期;杨向荣:《现代中国美学的论争与建构——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美学史的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8 期;胡友峰:《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国文艺评论》2022 年第 1 期;杨宁:《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内在线索与本土话语》,《江汉论坛》2022 年第 7 期;等等。还包括一些专著,例如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王向峰:《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年;袁济喜:《承续与超越:20 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戴阿宝、李世涛:《问题与立场:20 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章启群:《百年中国美学史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等等。这些成果系统探究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的重要理论、范畴、内涵、论争等话语体系,延展中国现代美学发展流变的知识谱系。与此同时,关于美学史书写的方法论研究、书写范式问题、逻辑思路问题以及美学史内在的书写角度问题等有待进一步研究,尤其是涉及美学史研究的文献史料整理和精神文化价值等需要宏观视野的细致论证,本文旨在深入考察关于美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问题,以期给当代美学建设提供崭新的书写范式与方法论资源。

串连了美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美学史书写有其知识范式与性质特点,可以划分为“知识型书写范式”和“思想型书写范式”两种样态。其中知识型书写范式立足于美学理论本体,但更加强调美学内部知识之间的联系性、整体性与谱系性,突出不同理论的逻辑关联;思想型的书写方式则实现了类似布尔迪厄所认为的知识“大生产”景观,强调美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互涉式联系,凸显美学的文化价值。而“当我们试着探讨各个发展阶段的审美意识的时候,我们面前的具体材料就不仅具有考古学上的意义,而且还构成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本身就具有价值的事物的重要部分”。^①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中国美学史”百年来得以生成、建构、确立和发展,呈现诸如知识型与思想型的双重写作范式。由此,美学研究者的学术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逻辑都存在差异,并在美学家研究、理论范畴研究、美学问题研究、美学流派与论争研究、美学文献史料研究等方面呈现丰富的多元化景观。通过对这些美学史著作不同的书写类型、范式和逻辑理路展开讨论,可以进一步认知书写者们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他们对美学史书写所作的探索和创新。此种关于美学史的“元历史”研究不仅能够重建更为复杂的美学历史叙事,也形成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整体认识。

一、知识型的书写范式与逻辑理路

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主体审美感性认知能力和艺术审美活动的独立学科,包含自身特定的知识框架,涵盖主体认知、审美活动、艺术哲学、美感经验等一系列内在知识逻辑,形成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多元理论面貌。与此同时,美学史的知识性研究并非仅仅立足于对美学理论本体的梳理与考察,而是试图展现一个更为宏观辩证的知识图景,探究不同理论范畴之间的逻辑张力关系。这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文献意识、历史话语与综合阐释的知识建构策略,以确立一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它们连续出现的次序,它们的的同时性中的对应关系,在共同空间中可被确定的位置”。^②由此,理论就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相关表述,而是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中形成本质化的“话语”关联系统,涉及该学科的知识生产、文化背景、学科互涉等问题,形成具有内部运作规律和外部协调共生的宏大知识图景。亦如伊瑟尔所言:“理论发现要处理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其他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它所传达的信息、它的符号关系的组织方式、它的不同展现模式以及这些模式间的相互交流、对其语境现实的干预、文本的加工和接受,以及对作品固有假设的揭示。”^③

中国百年美学史的发展,一方面是美学理论范畴逐步完善、框架体系不断完整的进程,形成了系列逻辑周密的知识体系,实现了本体论、主体论和认识论等多维度内在逻辑的建构;另一方面,现代美学史的发展处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社会启蒙发展的语境之中,美学与文学、艺术、社会、历史、教育、人性、意识形态等产生多角度的关联。文化启蒙、社会转型、现代意识、审美教育等知识话语塑造了美学不同的发展面貌,建构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美学“大生产”景观。由此,美学史的知识型书写涵盖双重维度:一是重点探究美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与理论范畴,主要内容一般是美学家的思想、见解以及“这些思想、见解通过一定的概念、范畴、命题所形成的理论体系”。^④与之相关的美学论争、美学现象和美学活动也成为学科生产、演化的组成部分。二是以宏观视野考察美学史发展的规律、动力与机制问题,在“元历史”的叙事视角下书写美学史的科学化系统化知识谱系。比如唯物论与美的本质问题、主体论与审美实践问题、生存论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塑造

① 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②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7页。

③ 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④ 聂振斌等:《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了美学理论的知识范畴，更在宏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定位了美学知识的坐标，彰显了现代美学发展的动力。专注于美学知识的内在发展和美学体系内部逻辑化建构的书写方式，可称为知识型书写范式。根据知识型书写范式的不同切入点和逻辑理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具体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为书写对象

这种美学史的书写内容，往往针对的是在百年美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学家的具体思想。书写者按照不同的线索和分类方式，对个体美学家思想进行呈现与阐释，串联起整个百年美学的发展历程。例如王向峰的《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梳理与评介百年美学史上重要的 18 位美学家各自的学术观点、思想精要及美学理论，在彰显个体学术价值的同时，勾画出中国百年美学的整体建构与发展流变。章启群的《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同样选择近百年来中国的几位重要美学家，对其思想进行有机梳理并按照三条线索分类书写：第一条书写线索侧重强调美学学科西学东渐与中国化进程，阐发以蔡元培、朱光潜等对西方美学的译介与传播；第二条书写线索集中论述具有中国特质的美感体验话语与艺术精神表达，论述王国维、宗白华和徐复观等对中国美学精神的拓展；第三条书写线索立足于美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进展与时代影响，指出蔡仪、李泽厚、朱光潜的美学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知识体系。在书写这些美学家具体理论的同时，著者也融入了自身对百年美学发展脉络的认识。薛富兴的《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 1949—2000》以 20 世纪后 50 年的中国美学为观照对象，深入分析了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和周来祥四位美学家的理论成果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中国大陆美学经历的发展阶段，总结出三大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集中于四位美学家的论述确保了对每位美学家书写与探讨的充分性，最后的经历梳理和特征总结，也使得我们对大陆美学的发展和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了一个较为整体的认识。陈望衡的《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以美的本体论问题为基础，对不同美学家的理论进行分类梳理和具体讨论，并展开美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这种书写方式将美学家理论的具体分析提高到本体论高度，形成与其他百年美学史著作不同的书写视野。

以上所列举的几部美学史著作，都是通过对具体美学家、美学思想、美学理论的书写，串联起整个 20 世纪美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这类书写能详细展现各位美学家具体的思想理论，揭示他们独立的存在意义和个体价值，又能通过串联个体展现百年美学的理论流变，并在整体梳理中发现个体美学思想在美学脉络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但需要承认的是，将哪位理论家纳入书写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书写者自身的选择，这就往往造成未写入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的缺失，从而导致学术价值一定程度的受损。另外，这类美学史书写，往往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风云等外部影响因素暂时搁置，而专注于书写美学自身的发展理路，从而抽离历史和社会因素，将生动活泼的美学史抽象成纯粹的“理论史”。这种忽视历史现实的单纯封闭的学理研究，也相对忽视了美学知识与理论发展的谱系性、系统性与社会性，弱化了美学发展的整体化学术面貌。美学史的发展与流变研究可以借鉴布尔迪厄提出的知识“场域”理论，以“大生产”的视野探究美学与社会、经济、主体、意识形态等元素之间的互动关联，凸显美学在文化语境中的思想意义。

（二）以美学学术论争为书写对象

20 世纪发生的几次美学论争具有“意识形态变革的背景、学术转型的内因和知识增长的基础，并且直接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史就是学术论争史”。^①既然美学论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自然就存在以百年美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几次美学论争作为书写对象的百年美学史类型。例如戴阿宝、李世涛的《问题与立场：20 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就将书写的重心放在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界所发生的三次大的美学论争上，在把握美学论争发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基础上，深入地辨析各家各派的美学观点、美学论争中涉及的基本美学问题。美学论争史的书写方式，在更加切近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展现了不同阵营之间美学思想观念的碰撞，彰显出美学发展

^① 杨春时：《20 世纪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过程中存在的多元观念和多重复调声音。美学论争不仅构成了美学史流变的知识谱系,也深化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范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内涵。从美学大讨论对美学本质的界定,到80年代“美学热”时期的审美启蒙,再到90年代实践美学的拓展与创新,中国美学话语在论争中得到不断丰富,形成了主体论美学、实践美学、文艺美学等一系列核心范畴。美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本体论问题、美的主体性问题、形象美与共同美的价值评判问题、主体实践与美的规律问题等,都体现了研究者建构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理论贡献。与此同时,美学论争也并非仅仅局限在学科范畴内部,而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实质上建构出“知识互涉”的文化景观,形成了关于文艺活动、意识形态、人性启蒙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等涉及诸多元素的美学话语,成为历史发展的时代镜像。对美学论争的个案分析则进一步凸显了知识型的书写范式,形成了以美学关涉历史的知识谱系学样态。这种美学论争史的书写,如何保证公正客观地对不同美学思想进行书写、阐释和评价,需要研究者注意。应摒弃门户之见,尽量客观地对这些论争进行解剖与书写,发现并肯定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三) 从古今美学的关系角度切入美学史书写

可以说,有许多美学研究都呈现为一种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美学问题的形态,以西阐中虽然能够有效吸收外来的美学理论资源,但也存在着对于中西美学的不同语境和差异话语的忽视,以及中国本位自主意识的缺失问题。因此,从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关系切入百年美学史的书写,高扬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和民族历史文化根基,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书写自主性中国美学史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概念范畴、表述方式以及审美积淀等已经内化于美学学者的理论视野之中,塑造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精神面貌。如果说西学资源推动建构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体制与逻辑框架,那么古典美学传统则成为理论的深层积淀,传达出中国美学的诗性气质。王国维的“境界”论、朱光潜的“审美直觉论”、宗白华的“艺术空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论”等已经把天人合一、自然虚静、神韵性灵等古典美学资源渗入理论体系内部,并成为美学本体论、艺术论、形式论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现代美学理论的专题阐释,以中西融合的视角深入考察古典美学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流变,进一步丰富了美学知识型书写的逻辑理路。例如杨春时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就是以现代性问题作为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在传统与现代、反思与启蒙的学术史框架体系中展开书写。美学史不仅仅是按照历史时间进行的线性表达,更由一项项重要的美学思潮构建而成。而20世纪中国美学的生成、发展、拓展都与整体化的社会现代性工程息息相关;美学的现代性进展也正构建了现代美学史的知识内涵,推进美学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学科自律的转型。比如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既呈现出早期现代主义“非理性”“意志论”特质,又带有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传统文化精神。李泽厚的美学理论则涉及“客观论”“新启蒙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三重美学思潮,形成了以主体论实践哲学为核心的美学延展知识谱系。袁济喜的《承续与超越: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就从近现代美学的重大问题切入,对20世纪美学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创新与应变加以论述,同时还从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朱光潜、宗白华与林语堂等着手,详细分析了其思想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传统,揭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天然血缘关系。这种从近现代美学问题回溯和探索传统美学所蕴藏的文化根源的书写方式,体现了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品格,有助于发掘和探索中国美学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精神内涵。

以上几种美学史书写,更多的是将美学思想看作一种具有专业性和学理性的知识,重点在于凸显美学内在发展理路以及美学研究和美学史书写的学术独立性。其书写内容主要是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美学或艺术事实,侧重于美学知识的描述和呈现,因此能够较为客观地再现美学思想的百年发展历程,并在尽力排除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使美学史的书写更具学理性。但这种知识型书写范式,也存在着“学理性有余而思想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其更多关注的是美学内部的知识,所建构的是一种逻辑上自洽的美学知识体系,从而弱化了对广泛的社会现实和更深刻的重大问题的关切。另外,因其采取的方法论原则是基于一种美学学科内部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语言和工具是一种“美学的话语”,在推

动美学研究更加精致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的同时，也容易让研究者在无意识中受到既有美学研究范式的限制，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对美学研究和美学史书写新思维和新方法的探索。

二、思想型的书写范式及逻辑理路

与知识型书写范式不同，还存在着一种思想型的美学史书写。^① 秉持这种书写范式的学者认为，“要想充分把握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真实历史及其学术演进轨迹，就必须全面进入整个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历史真实之中，以一种整体联系的文化反思活动来考察包括纯粹理论在内的美学学术进程”。^② 即是说，美学在他们眼中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具有自洽逻辑的知识体系，而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美学“与其说是一种逻辑化的知识体系，毋宁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察社会的角度”。^③ 因此，通过对美学思想的分析和探索，就能够触摸时代思想的变更。在此观念下的美学史书写就不仅仅着眼于“那些具体概念、命题或观念等的自我演化线索或个别美学家的理论成就”，^④ 而是从思想层面切入对美学理论和审美现象的观照，重视美学的历史-文化规定性。著者将 20 世纪中国美学置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考察，梳理其学术演进轨迹，发掘各美学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动向，并总结出“它们在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基本倾向或带着普遍性规律的东西”。^⑤ 思想型的书写方式将美学视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美学的“症候式”研究方法与意识形态效应，将美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对美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历史语境、流变机制以及文化价值等维度的专题研究。比如启蒙主题与美学救赎原则的拓展、意识形态与审美反映论的凸显、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美学的价值确立等，这些不仅着眼于美学自身的理论特质，更是将美学视为宏大现代性工程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注重社会历史性、文化联系性和思想整体性的美学史书写范式，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从现代性角度切入的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

20 世纪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学是在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和自我矛盾”^⑥ 中产生并发展的，美学的演进、变革与中国现代性目标紧密互动。因此，从美学与现代性角度切入，成为百年美学史的一种书写方式，表现为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思想的差异和变更。例如尤西林的《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就从现代性角度进入，结合“思想”的社会状况，通过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审美经验个案的研究，分析了现代大众审美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文革”美学的特性和思想根源、形象思维论、80 年代美学热和 90 年代审美异化等问题。著者既关

①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知识型”与“思想型”书写范式构成了“元历史”研究策略。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区别于单一的美学理论本体研究，而是以宏观范式和整体视野全面探究美学的生成机制、文化坐标、知识谱系和话语关联等问题，将学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知识“场域伦理”与“大生产”相结合，实现对美学史“研究的研究”“方法论的研究”。“知识型”是将具体、个别的美学理论范畴进行系统化、总体化、历史化，以知识互涉面貌展现美学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张力关系，它不仅着眼具体理论范畴，更以宏观视野强调知识网状结构的内在关联，探究美学史发展的方法、机制等问题。而“思想型”凸显美学“外部研究”策略，探究美学与社会、时代、历史、地理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美学放置于社会文化的坐标体系中。二者体现了美学史研究方法层面的区分，但在具体的美学史写作中，这两种模式往往交融在一起，共同构建了美学发展的知识景观。例如杨春时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就实现了两种书写模式的结合，既梳理阐释了美学史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也彰显了美学在现代性工程中的审美救赎与文化启蒙价值。杨存昌的《中国美学三十年》以知识型书写为主，同时也涉及中国古典美学、西方现代美学、审美心理学、文艺美学等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实现对审美活动、审美关系和美的本质问题的意义考察。

② 王德胜：《20 世纪中国美学与学术史写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③ 周宪：《美学及其不满》，《文学评论》2020 年第 6 期。

④ 汝信、王德胜：《“20 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总序》，戴阿宝、李世涛：《问题与立场：20 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第 1 页。

⑤ 邹华：《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 页。

⑥ 张法：《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历程》，《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注政治、经济到技术的现实状况,又强调当时的精神氛围、人物事件,还捕捉当时人们的心态和社会思潮。在新启蒙的语境中,美学问题成为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恢复主体自由感性活动的理论承载。人性的反思、主体性的确立、形象思维的展现、共同美的考察等建构出从美学理论到思想史书写的知识谱系。美学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启蒙、凸显人性自由、实现审美独立的重要话语。这种美学史书写,是将中国现代美学当作一个现代性事件和现代性思维进行考察,有助于拓宽美学思想史、理论史的研究视野,带来新的研究景致,也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学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关注审美意识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的表现。

另外一种现代性美学史的书写范式,表现为通过提出问题、设立专题、分析个案的方式,探寻美学自身学术演进的思想契机和发展机制,并将其与整个时代思想和文化运动具体相联系,考察美学发展进程的历史、文化契机。例如王德胜等人的《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就通过引入问题、分析个案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研究,将百年美学问题的生成、转换与深化的精神实质放置在整个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事件中去考察,将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理论建构纳入百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汝信、王德胜主编的《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也改变了单纯从逻辑上追求体系化的形式,选择以提出问题、设立专题与具体论证等更加开放的方式,在历史行进中展现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现代性理路,突出了美学发展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中的关键问题涉及美学“本质论”与“存在论”话语、美学研究的方法、美学的知识形态等内容,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而审美心理学、文艺美学、实践美学也都成为重要的专题研究对象。这种提出问题、设立专题、分析个案的现代性美学史书写范式,在每部分紧紧围绕一个美学问题展开探讨,同时又将美学问题与整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充分展示了著者对于历史的深刻省察意识与价值追问立场,有利于在宏观上揭示20世纪中国美学总体学术面貌。

(二) 主题史的书写方式

纵观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内容相互关联的主题,如西方美学的传入、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嬗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主题史即以美学的内部核心范畴为核心,采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炼出美学史的重要命题,凸显美学在发展流变中的文化思想价值。比如,与美学话语体系相关的艺术哲学问题构成理论的基础,文本的形式意蕴与思想内涵塑造出特定的美学主题;美育拓展了美学知识中的感性审美元素,并将其与主体的自由发展进行联系,彰显美学的人文价值;跨文化视野往往选择一些核心概念、范畴与主题进行融合,在美学的本体论、形式论等方面实现理论的丰富与创新;美学意识形态理论则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话语,将感性、审美、身体、艺术等视为社会与主体解放的重要渠道,以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特定的美学主题不仅内蕴特定的知识内容,更成为美学思想价值的凝聚,表征出时代发展的思想脉络。例如祁志祥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就在丰富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探究了现代美学学科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不仅细致阐发了不同历史阶段美学家的美学观点与理论范畴,更凸显了美学与社会、时代、人生之间的价值关联,展现了美学在特定时期的人文价值,涉及美学价值论、方法论、存在论、体验论等一系列思想主题。比如近代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阶段;“五四”时期则开启了“有美有学”的美学学科;21世纪以来美学进入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这就清晰概括出了美学史发展的不同主题,并在社会启蒙与意识形态等文化背景中延展美学思想脉络。著者还将美学价值评判融入主体概括中,如评价康有为的美学思想是“去苦求乐,雄肆唯情”、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涉及“三界革命:以美文学样式为政治改良服务”、中国特色美学学科体系构建是“乐感美学”^①等。聂振斌的《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围绕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及哲学、跨文化美学、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美育等一系列主题,展开了美学史写作,既描述了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的产生、发展,还探讨了它们与社会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的关系,并将其提高到哲学层面加以概括。主题史的书

^① 祁志祥:《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9、59、619页。

写方式，紧抓美学发展的核心主题和主要路标，并在紧密结合社会文化状况下探讨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百年美学发展的历史面貌。

（三）审美理想史的书写范式

审美理想根植于社会历史的变革之中，包含着现实的社会变革与抽象的理论发展之间复杂而又隐蔽的联系，还能够将历史发展与艺术实践中最普遍的现象和最本质的趋向提升为美的时代精神和总体氛围，揭示美学发展的基本倾向和深层的普遍性规律。因此，把握住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审美理想，就抓住了百年美学的发展主脉。综观百年美学的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从古典和谐美向古典崇高美的变化，“崇高”作为现代美学的主要审美理想，成为百年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总范畴。例如邹华的《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就围绕“崇高”这一美学范畴，将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命运与“崇高”这一审美理想的历史发展相连，通过审美理想的演变，反映百年美学发展过程中审美关系的变更。围绕审美理想展开美学史书写的方式，有助于适当削减一些从属范畴和次要细节，抓住审美文化现象中的主要线索，突出百年美学的根本风貌和演进主线。但这也容易忽视那些与主流审美理想有所偏离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意识，造成“主潮”视野对具有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意识的遮蔽。或者说，著者在追求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书写过程中，更加侧重运用逻辑方法抽象并概括美学发展的历史现实，关注的是中国百年美学历史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过滤掉了对个人经历和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封孝伦的《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同样关注到了崇高美，不仅在纵向上对其在百年美学中的发展历程展开描述，还在横向上将美学放置在特定时代下的生存条件与社会关系中进行描述，按照“审美场-审美创造-美学理论”线索把握一个时代的审美创造和美学理论的特色，揭示产生这些成果的审美创造和促进或制约这些审美创造的社会基础，使得美学史的书写因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显得更加生动而具体。杨春时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也在不同美学思潮的逻辑关联中，凸显了以“现代性体验”和审美存在论为基础的审美理想。美学史不仅是流派思潮的知识型总结，更应内蕴感性审美力量与时代文化价值，审视理性主义高涨所带来的生存意义困惑与主体性的内在束缚，重新延续审美现代性的感性体验话语，在艺术审美自由的基础上获得生命存在意义，这是现代美学书写所应秉承的价值立足点。当代美学的存在论话语，通过“主体间性”和后实践美学重塑审美理想，拓展美学学科发展空间。而“审美体验的结果即审美现象学还原的产物是自由，自由就是审美意义，也是存在的意义”。^①由此，美学史书写就包含了感性、存在、自由、超越等一系列价值论话语，以审美理想拓展美学理论的人文关怀。

（四）从美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美学史的书写

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以美学与政治为主题的书写方式，不仅为深入地思考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展现了在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环境下美学蕴含的意识形态性。例如骆冬青的《20 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就系统阐释了“政治美学”的理论内涵与知识体系，并认为政治与美学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联，审美情感、感性体验、艺术典型、形象叙事等都内含意识形态话语，彰显了特定的文化权力关系。通过对政治学与美学的知识内涵、启蒙话语以及人文关怀的考察，阐明了二者在审美教育与精神自由等方面的共同属性，凸显美学的意识形态反思价值。在此基础上，著者还深入考察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社会动力机制，涉及美学热潮、著作译介以及学术争鸣等活动，全景展现政治与文艺思潮背后的美学精神。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20 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从美学与政治的纠结互动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的美学热进行别开生面的阐释，书写了崇高美学在 20 世纪的中国逐渐被“政治化”的过程。聂振斌的《思辨的想象：20 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戴阿宝等的《问题与立场：20 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也都在知识书写与主题史研究中细致阐释了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凸显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展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进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契合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语境，并确立

^① 杨春时：《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年，第 308 页。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审美的对象化生产、艺术反映论及意识形态论成为美学话语的关键命题,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知识形态。80年代的“美学热”与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人道主义大讨论”等问题息息相关,逐步形成了关于主体性、共同美和实践美学的理论形态,重新确立了美学自律原则基础上的启蒙救赎话语。可见,美学与政治之间形成的理论关联,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实现了美学与社会、文本与思想、文论与历史的交融。而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美学话语自身已经成为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内蕴审美启蒙的文化价值。

(五) 从跨文化视野切入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书写

20世纪中国美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美学学科话语的引入、发展与转型,都无法忽视西方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影响。西方美学话语作为一种“先在必然性的理论话语”,^①对中国美学的建构起着不容忽视的持续影响。通过文化变异而生成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中西文化的因借互动关系,创造性的转换机制,以及学理、思维和概念层面上的会通融合等特点”。^②因此,一种既将美学放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总体背景下进行宏观把握,又在横向的中西对话中梳理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进程,实现不同文化背景学术话语的相互对话的美学史书写范式必不可少。例如朱存明的《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就以中西贯通的书写方式,将20世纪中国美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并划分出“美学启蒙”“移花接木”“意志实践”“美学批判”“人化自然”“美的规律”“审美文化”等若干专题,以个案分析与总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究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及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对现代美学学科的知识重塑价值。其中,感性情感话语不仅塑造了美学的基本面貌,更被纳入社会文化启蒙的宏大语境之中,成为推动美学发展流变的动力机制,实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双重统一。将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放在全球背景下进行考察,中西视野融合,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美学思想流变的全貌。另外,在世界视野下阐发中国美学,也可以更加清晰地定位中国美学所处的位置,并且发现中国美学所具有的独特性。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思想型的美学史书写内蕴鲜明的“介入”特征,融入了书写者自身对美学思想和审美现象的因果性思考和纵深性探索,体现了著者对百年美学发展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关怀。因此,这类书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元方法论”的特征,提供了一种理解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思路、新框架和新视角,同时这类著述并未将视野局限在美学领域之内,而是广泛探讨美学与政治、文化、历史等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这就打破了美学学科内部既定的研究范式,进而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获得崭新研究视野和理论工具的基础上,推动了美学研究新方法的获得。

综上所述,如果说知识型美学史书写范式,是通过美学知识发生和知识增长的过程展开书写,推动了美学发展的逻辑体系的构建和美学知识的系统化描述,促进我们了解百年美学内部的知识变更;那么,思想型美学史书写范式则将美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通过对美学史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索,触摸美学思想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两种类型的书写方式各有侧重,各有擅长。美学史的书写不能缺乏对美学知识的自我生长和逻辑演变的观照,这样才有助于推动美学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以及美学体系的严密化和逻辑化,同时也要观照美学与社会广阔领域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美学放置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理解,这样才能把握美学理论背后隐匿的更深层次时代思想脉搏。

三、20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范式的理论总结与问题反思

以上,本文对百年美学史的书写范式和逻辑理路进行了大脉络的探讨,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了解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帮助,更为未来美学史书写提供了新思路。知识型书写范式以“内部”研究的视角重点考察美学知识的谱系关联,展现美学

① 王德胜等:《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聂振斌等:《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第144页。

“元历史”映照下的具体理论问题，凸显理论的生成与演变机制；思想型书写范式以“外部”研究的视角审视美学史与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关联，将美学的学科发展放置于社会历史流变的进程中，考察美学的话语意义与意识形态功能。在具体的美学史书写与研究中，这两种范式往往是共同存在的，呈现出从知识范畴到文化思想、从理论结构到意识形态的美学史话语景观。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美学是道德意识通过情感和感觉以达重新表现自发的社会实践之目的所走的迂回道路。”^①

与此同时，在知识型和思想型共同研究视域之外，也存在一些亟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并能够有效参与到美学史书写中。比如“美学文献”提供支撑美学家思想、美学论争以及美学主题史书写的扎实有效的文献资源；“美学精神提炼”是对美学主题史、美学意识形态话语、美学现代性理论等问题的进一步凝练与阐发，总结百年中国美学历程的深层动力与意义价值。所以，“美学文献”“逻辑思路”“精神提炼”等美学问题一方面是对两种美学史书写范式的价值总结与升华，拓展了美学史研究的知识框架；另一方面也以反思的视角提供必要的知识学资源与研究方法，为美学史书写寻求更多突破的空间。

（一）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的文献处理问题

无论是知识型还是思想型的美学史书写，无不是建立在原初史料基础之上。如何从复杂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发现那些对推动 20 世纪中国美学起到重要作用的资料？如何将学术史资料进行判断、归纳与取舍，并纳入美学知识谱系的发展流变之中？如何通过历史上具体的美学活动，系统阐释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借助纷纭复杂的个案分析，综合提炼有价值的研究主题或者研究范式，从而凸显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这些都是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的核心问题。美学文献资源的整理、编撰与研究直接决定美学史的书写范式。而强调文献研究对于美学史书写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美学文献可以廓清现代美学研究的特定问题。纵观 20 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史，文献研究实现了美学研究方法“自下而上”的转型。无论是美学知识谱系的梳理，还是美学论争的问题分析，抑或美学观点的阐释、美学理论的建构以及美学意义的彰显等，都需要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文献“文本细读”不仅推动了美学史研究微观与宏观的整合、文献与理论的结合，也可以拓展美学观点、美学论争的研究视野。例如，在追问 20 世纪中国美学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亦即到底什么是中国现代美学最根本的“现代性”特征这个问题上，依据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从西学东渐、美学东传、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精神启蒙和国家救亡、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等方面去探究不无道理，但类似“审美无利害性原则成为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分水岭”等观点，便有待商榷。审美无利害性固然将审美从传统的依附、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的功利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让审美具有了现代的独立品格，但同时也意味着使所谓审美独立性变成与现实人生无关的高级摆设，因而并不合适 20 世纪中国美学语境。这是一种主观预设的理论观点，是对西方无利害思想的借用，而不是建立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发生的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实际上，20 世纪中国美学建构的逻辑起点不是西方美学盛行的“审美无利害”，而是审美与社会启蒙之间的内在关系。审美不是建立在形式自律与学科场域基础上的孤立存在，而是成为推动感性完善、促进社会改良的重要话语承担，现代美学先驱王国维的悲剧艺术论、蔡元培的审美教育论以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无不体现了审美的社会人生价值。

其二，美学文献能够展现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视角与新面貌。如果说现代美学研究所涉及的“审美无利害”“现代性”“文化启蒙”等问题需要从美学论著等文献中进行探究，不断深入发掘中西美学融合的生成机制与流变机制的话；那么当代美学研究同样能够在文献中获得“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理论视角，比如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阐释就需要大量的理论专著、档案材料、日记书信以及回忆录等文献材料作为支撑。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远不只是关乎个人陶情冶性的小问题，而是参与

^①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 页。

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20世纪初,美学直接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启蒙运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学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中,获得了理论的拓展与知识的完善。“唯物反映论”“主客观统一论”“实践本体论”“审美主体论”等重要理论范畴的生成与美学论争、社会环境等息息相关,实现了美学学科的知识“大生产”面貌。这些都需要回到美学现场,对原始的文献进行细致的把握。

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通过深入理解文献资料,会发现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是审美独立论与审美救赎论。但是,关于审美独立的思想不应该仅仅从王国维先生的美学思想中挖掘,而应立足于具体美学文献,综合辩证考察文学流派、文艺期刊、美学译介、文化思潮等对美学知识谱系发展的重要影响。王国维的审美独立思想借鉴了西方康德与叔本华的“审美无功利”理论,这些给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科形塑提供了知识框架。而前期创造社所倡导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模式、“零余者形象”以及伤感之美的表达等,同样强烈凸显了审美独立的精神气质。以徐志摩、穆木天、李金发等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歌倡导“纯诗”的概念,极大展现了主体“感觉”要素与自我表达意识,以“浓得化不开”的审美意象来映射心灵之美。可见,文学的形式追求与情感表达呼应了美学层面的审美独立浪潮,构建出“向内转”的美学理论面貌。与此同时,美学的“向外转”视角与社会批判理论也不仅仅是西方现代美学的特有观点,我们可以更加关注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理论,他们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气质,凸显了文艺文本的审美属性;另一方面也将审美与人生、社会、启蒙进行关联,显示美学的文化启蒙功能与感性救赎价值。朱光潜的“审美直觉论”“美感经验论”、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生命超越论”等都丰富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形态。总之,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面貌的书写,必然要在处理这些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细致研析20世纪中国美学所涵盖的多层次基本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联。

(二) 20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的逻辑思路问题

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目标的,但由于社会启蒙与思想启蒙任务的重要性,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论、“为人生”的文学等逐步成为显性的时代话语,体现出浓厚的历史主动性与文化反思意识。因此,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的叙述,展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独特旨趣。同时,诸如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进程与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美学之间的互补融合、中国现代美学的知识范畴建构、中国古代美学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美学家在理论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贡献和局限、中国美学的可持续发展和原创性发展等问题也需要关注。另外,从学科的角度,还要研究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范畴、体系、关键词、话语方式等演变问题。只有经过这种研究,才能在学理上深入论证20世纪中国美学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贡献,推动启蒙、美学、现代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联,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总之,将20世纪中国美学视为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并揭示其发展历程中的不同层面和所涵盖的不同问题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的内在逻辑思路。在此逻辑思路的基础上,还需要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整体视野。以美学历史文献与美学活动史实为基本立足点,构建全面整体的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景观。美学文献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能够展现美学历史存在的真实面貌。比如通过《新青年》《新潮》《文学周报》等相关期刊的资料研究,勾勒美学与文艺活动在整体文化语境中的发展变迁。与此同时,对资料的个案研究也要进行史论维度的归纳与总结,将具体事件放置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演进的知识谱系之中,发掘美学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知识场域之间的深层关系结构,以整体视野探究美学的思想价值。

第二,学科互涉。以知识谱系学的方法对美学进行文化考察,广泛展开美学与文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科互涉,实现美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一方面以审美感性与审美独立确立美学内在的知识属性,确立美学学科的独立合法价值,另一方面从本体论与价值论

视野提炼出现实、社会、革命、主体、人性、生命、文化等若干关键理论范畴，建构美学发展的内在知识脉络，彰显百年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规律与价值。

第三，知识生产。细致探究美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深入考察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与知识积累的进程，以特定的美学范畴、主题、概念、形态等为核心，探究理论自身演变的内在规律与生成特性。美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引领、西方现代美学资源的引入、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延续以及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都推进了美学知识增长，实现了美学本体论、形式论、文本论和价值论的丰富与拓展。与此同时，美学论争也起到知识生产的“激发”效应，促使美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凸显与理论专题研究的持续进展。

第四，中西融合。全面审视西方美学资源与中国美学资源的交流、融合与建构，以“西为中用”“交流互鉴”的方式重构现代美学话语。一方面，西方美学资源推动美学学科知识框架的建构，塑造了美学的若干概念范畴。另一方面，西学资源在中国也进行了吸收、变异与演化的进程，并作为知识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样态。

第五，个案研究。深入探究中国美学家群体的理论观念、知识内涵、理论贡献等，以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个体与时代、美学与文化、学术与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是由不同时代的“学者群落”推动建构而成，并在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形式论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资源，部分美学家的理论在社会文化浪潮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时代价值，不少美学家跨越了不同时期。所以，既要重视不同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变迁对美学发展的影响，也要探究美学发展流变中的整体性与连续性，梳理出特定美学家、美学流派和美学思想的知识体系，展现美学的历史意义与文化积淀，凸显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整体价值。

（三）20 世纪中国美学精神提炼问题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价值评判与理论定位需要审视世界美学的整体面貌，不仅要考察普遍性美学问题在中国美学中的呈现，更要凸显中国美学的理论特色与精神气质。这就涉及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精神的提炼问题。在美学的知识流变中，审美救赎论与现实立场构成美学精神的重要凝聚，并塑造了美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一方面，现代美学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宏大历史语境中得到发展，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知识话语产生密切关联，呈现出文化启蒙的审美救赎景观；另一方面，中国美学的发展受到一次次美学论争的激发，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形成了较为明晰的审美反映论、现实性、人民性特质。

第一，审美救赎论的话语延续。20 世纪的中国美学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中，在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殖民反抗和压迫中产生并发展的。因此，原本在西方作为专门领域学问来研究的美学，到了 20 世纪的中国，却由于“美丽的误会”而激发起大众的无限热情，成为备受关注的显学。20 世纪中国的美学形态尽管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是审美独立论和审美救赎论。审美独立论虽然有其一定的地位，但占据主流的审美并非是关乎个人的吟咏情性、陶冶情操，相反，审美救赎论显然更加符合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语境，也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实质和精神。从“五四”时期“西学东渐”语境中的启蒙焦虑，到 80 年代新启蒙的人道主义审美价值确立；从审美反映论的意识形态呈现，到主体实践论的精神与审美自由，美学成为实现文化启蒙、促进主体自由、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承载。审美救赎论以审美独立论为基础，最终建构起美学意识形态的知识谱系。

第二，中国现代美学的现实立场。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与现代中国学术体制的建立具有同构性关联，西学资源倡导的学科体制、大学制度、分类标准等改变了中国传统经学的学科面貌，形成了更为清晰的学科门类，成为文化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三方面的因素不断推动美学学科的建构与传播：西方现代美学资源确立了审美的独立属性，建构出从文本到感性主体的美学话语内涵；中国“五四”时期文化启蒙与审美教育推动了美学学科的成熟；中国传统美学资源融入现代美学话语体系，并焕发出崭新的面貌，成为世界美学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者而言，就面临如何处理依赖西方思想资源和民族化诉求之间的矛盾，而这又常常演化为到底以

“西方美学”还是“中国古典美学”作为学术资源的问题,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问题。将中西美学资源放置于“传统与现代”“古典与启蒙”“中国与西方”等二元对立框架中进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美的本质、主体感性以及美学价值等问题的理解,但相对而言也“悬置”了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话语生成基础的阐发,忽视了美学生成、发展与流变的现实土壤。无论是美学“为革命”的现实意识形态诉求,还是美学“为人生”的审美精神超越,抑或是“为艺术”的形式美学建构与个体性感抒发,中国现代美学都是社会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革命、改革与建设的社会现实产生“镜像”般的密切关联。实际上,20 世纪中国美学既不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传承,也不是对西方美学的照搬,而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在国家的现代性发展语境中,因现实所需发展出来的一种审美理论资源。它是汲取了西方美学某种勇于搏击现实的审美救赎态度,并落实在中国具体的现实语境下才产生的审美精神。鲁迅所强调的文学阶级性话语与“摩罗诗力”有效激发了文学启蒙的进程,推动“左联”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成功;朱光潜的审美趣味与文艺人性论强调了审美的道德伦理意识,对青年人的成长起到理论引领的作用;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念彰显美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突出了美学的现实意义;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实现了审美感性与理性积淀的融合,并将情本体渗入主体心理文化结构,实现社会“乐感精神”的释放,等等。可见,20 世纪中国美学已经有机整合了西方美学理论与中国美学资源,建构出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现实的美学品格。从审美反映论到主体实践论,从文艺革命论到自由人性论,美学家们虽然秉承相异的理论观点,但是体察社会现实、彰显人文关怀的美学目标却一以贯之,共同塑造了美学的实践性面貌。

作为最为关注人的价值、意义的人文科学,20 世纪中国美学伴随着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一大批美学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还是一个个美学流派和一次次美学大讨论给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提供的经验,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20 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虽然有过曲折,但从起步始,都是中国在融入世界发展洪流过程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实立场、现实指向已成为中国美学精神的另一条脉络,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的美学史书写,将进一步建构更加成熟的中国美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彰显中国自主的美学话语,不断拓展美学知识空间,为主体审美自由、社会文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美学知识生产提供理论资源。

(责任编辑:庞 礴)

Luce, who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ree different cultural memories. Through comparisons of symbolic meanings between London city culture and the country culture of *Howards End*, Foster also explores social questions, including the decline of moral and religion, and unemploy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despi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erial expansion. Foster demonstrates his anxiety towards the future and the orientation of England, and initiates the famous memory question of crisis and inheritance, namely, “Who shall inherit England?”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anxiety of the Schlegel sisters’ wandering life in London, inner sins of the Wilconxes’ suffering, and the uncontrollable fall of Leonard’s collision of his world, these symptoms show deep internal divisions of social classes and collapse of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underneath the apparent Victorian grace,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All these social phenomena, whether they are the conflicted family relations or the obvious discomposure of social members’ behavior and mental status, show a rupture of people from all classes with the stable and peaceful tradition. Accordingly, these conflicted and opposed elements in *Howards End* are essentially opposition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memori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ical changes and class interests will influence us on how to define the past and how to inherit its value. Cultural memory is a course of being chosen and being interpreted. Luce in *Howards End* refers the reader to the image of Demeter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earth and crops in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Representing a steadier and organic country life memory, this image aims to construct the more stable cultural symbolic structure and the more firm bonds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uce and the earth resists the philistine middle class value of the Wilconxes, and her choice of Margret as her inheritor of *Howards End* forecasts that the latter will connect the English traditional ideals of culture and also lead the direction of the industrial class. This inheritance of *Howards End* indeed is the result of British cultural memory choice, in which the country life memory is put on top of other images. Connecting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memories, the image of *Howards End* becomes the ultimate choic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in the particular community. In this way, Foster tries to build *Howards End* in the novel as the realm of memory which own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belonging and cohesion.

Key words: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 Memory collision; Memory inheritance; Realm of memory

The Paradigm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 History Writing in the 20th Century

Hu Youfeng

Summary: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constitute a grand history of aesthetic development, forming a multi-level overall system includ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disciplinary discourse, which had promoted Chinese 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form to modern form. However, the study of aesthetic history writing not only includes theoretical ontology research, but also requires research on it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aradigms, overall structure, and logical thinking.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lucidate the different paradigms of aesthetic history writing, highlighting the structural, historical, and continuous characteristics of “meta history” research. As a resul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presents a dual “knowledge-based” and “ideological” writing paradigm, highlighting a diverse landscape in the research of aestheticians, theoretical categories, aesthetic issues, aesthetic schools and debates, and aesthetic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Based on the ontology of aesthetic theory, the knowledge-based writing paradigm emphasizes the connection, integrity and genealogy of knowledge within aesthetics, and highlights the logical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theories. Aesthetics is regarded a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research”,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cademic independence of aesthetic research and aesthetic history writing. The paradigm of knowledge-based writing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writing with the aesthetic ideas and theories of specific aestheticians as the writing object”, “writing with aesthetic academic debates as the writing object”, and “writing with aesthetic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aesthetics”.

The ideological writing style regards aesthetics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social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symptomatic” research methods and ideological effects of aesthetics,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nternal research” and “external research” of aesthetics, and achieving thematic research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historical context, changing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values of aesthetic development, which had constructed an aesthetic history writing paradigm that emphasizes social historicity,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ideological integrity. The ideological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perspective”, “thematic historical approach”, “aesthetic ideal historical paradigm”,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esthetic history books, and grasps the deeper ideological pulse of the era hidden behind aesthetic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aesthetic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aesthetic issues such as “aesthetic literature”, “logical thinking”, and “spiritual extraction” summarize and sublimate the value of two writing paradigms of aesthetic history, expanding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of aesthetic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s necessary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rom a reflective perspective, seeking more space for breakthroughs in the writing of aesthetic history.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enrich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aesthetics, but also effectively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spread the voice of Chinese aesthetics.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Writing paradigm; Aesthetic spirit; Aesthetic redemption

On Paul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Action

Zhang Jin, Pu Rui

Summary: Hermeneutics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solid” language texts, so that the hermeneutic theory of “lived” action has been in a relatively poor position. Paul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action” starts from action, and returns to action through textual mediation. By de-psychologizing the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and further transforming the meanings of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he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extual hermeneutics” to “hermeneutics of action”, and then expounds the mutual penetration of “explanati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action of text. Once the text is formed, it has its own materiality and objectivity, and its meaning needs to surpass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 in the later reading and comprehension. It is not only “saying” something, but is also “doing” concrete things as a practical actor.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or the actor cannot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vent, but is merely one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utcome of the event. Ricoeur penetrates criticalness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tanciation”, believing that the action of text makes “distanciation” into being,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return to the previous context. So, it is a process of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Compared with Hans-Georg Gadamer’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that returns to tradition,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action” is more inclined to criticize tradition, which is a kind of plann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The “distanci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action of the text does not cause the non-objectiv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but conditio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action. Action is not composed of a single actor, but the coordinated operation and “improvisation” of “multiple-agent”. The actors as human beings are not the “subject”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sense; instead, they are bound by the action with some initiative, understanding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giving up themselves.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action” is a “downward” way to return to epistemology in the history of hermeneutics, which undoubtedly reserves space for re-critical reflection on hermeneutics itself.

Although “hermeneutics of action” does not get rid of the “language/symbol modality” completely, it is rooted in classical hermeneutics theory making the “solid” language text “relived”, and reveals part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It gives birth to a new interpretation mode of “action”, echoing and joining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trying to change the hermeneutic theory. When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action” meets the contemporary emerging action theory, it might generate a “hermeneutics of action” theory which would have more interpretive efficacy and lead to a multimodal “event hermeneutics” in the end.

Key words: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of action; Recontextualization; Multiple-agent; Language/symbols modality; Event hermeneutic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ly Declassified U. S. Archives

Li Li

Summary: The current nuclear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tems from the escalation of 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fter the crisis broke out,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the first public high-level bilateral talks with North Korea. A joint statement was issued, wherein North Korea agreed to temporarily suspend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supported the denuclearization goal outlined in the *South-North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lemnly pledged no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other force against North Korea, and not to interfere in its internal affairs.

However, after the second round of talks, as North Korea focused its attention primarily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were un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erification, North-South dialogue, and exchanges of special envoys. U. S. -DPRK bilateral relations became tense. To avoid diplomatic impasse,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resum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is triggered strong opposition from South Korea. To alleviate South Korea’s concerns,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link the third round of U. S. -North Korea talks with the resumption of envoy exchang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